

没有想到,《人道》如此好读,一下子就能把人抓住,且读来忍俊不禁。当我得知作者是一位基层官员,是一位地市级主要负责人,不免有些惊讶和疑惑:官运和文运何以在他身上结合得如此均衡?但观其文笔,从容不迫的叙事,设悬念,拟对话,刻画细节,摹写言谈举止的能力,以及那暗藏的揶揄和民间智慧,确也不在某些专业作家之下。后来了解,原来作者创作有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写过多部中短篇小说,不肯间断,近年另有长篇《人精》问世,被改成电视剧《小鼓大戏》,颇受观众好评。他自云,年轻时“以文得官”,年渐老“以官得文”,言下之意似乎是曾因舞文弄墨得到赏识入了仕途,久经仕途上的历练和蹭蹬,反过来又给了他创作上的资源。他这样说,我才感到释然。天下之大,人材不拘一格,此或为一例。

我认为《人道》的特点还是非常突出的。首先是,生活的真感情和生活内在的逻辑力量体现得比较充分。要看到,生活内在的逻辑力量是强大的,只要忠于生活的真实,往往能产生格外的感染力、征服力。正所谓,生活有时比戏剧更富于戏剧性。与一些耸人听闻的官场小说相比,《人道》要可信得多。有些作家并无多少官场生活积累与观察,却爱写官场,难免流于概念化、说教化;还有一路,虽慷慨有加,但夸张失度,用力过猛,把贪官搞得青面獠牙,妖魔化、漫画化,痛快固然痛快,反而不见了人性的深度。我看,在细节的生动、人物的血肉丰富方面,有些作品还真拼不过《人道》。当然,未可一概而论。这里,是否熟悉生活、善于分析生活,能否把握好分寸,起着重要作用。比如,在小说中,几乎所有官员私下里都厌恶

# 贪婪人格与醒世之声

□雷达

恶马里红的死缠烂打、赤裸裸的跑官要官,但最后在人事安排上,仍然是马里红处处占上风,遂心愿;这些官员大都违心地推举了她,以至邪气压倒了正气。这里存在着极大的复杂性。俗话说,人恶人怕,人善人欺,他们或惧于她的威胁,或得了她的好处,或仅仅出于尽快打发她走人,或误以为她有更深的背景。

我由此感到,作者作为一个官场的“中人”,还是能反观、能内视、能省思的,这比较难得。他能看到负面力量往往非人力可以遏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在纵容着马里红式的权力狂,使之得逞。固然有与之勾结者,但更多的却是并无勾结者,正是这些官员的动摇、怯懦、自私、苟且、毫无公心,造成了更大的危害。这种反思精神贯穿在整部小说中。

看得出来,全书的人品、两种命运际遇的,甚至原本想首先大力塑造一心为民、医德高尚的杨晓静,但写着写着,马里红夺了戏,变成真正的主角。不是说杨晓静写得不好,有些章节也很感人,很见个性,然而,马里红的动作性更强,身上戏更足,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这个形象的现实感和典型性更为突出。应该说,马里红成为全书的主人公,有深刻的根源。

马里红是当今官本位文化熏陶下,在合适的气候土壤上疯长起来的一株恶之

花。她“敢踢敢咬,是个天都敢摸的女人”,一个贪婪的权力狂女人。我们见过许多男性贪官,却鲜见这种女性钻营者“官迷”,于是这个人物因其女性的文化身份而具有新的意义。事实上,在这个欲望化的时代,女性和男性一样,同样会被煽起勃勃野心,“女人啊,你的名字就是软弱”这句箴言,在某种意义上需要修改。那种只看到男权中心社会女性的受压抑,却看不到人性的共同性、历史性变化的观点,也需要修正。现今许多腐败的事实证明,没有男女的共谋,是完成不了的。小说中的马里红具有一种贪婪型人格,她心中烈火熊熊,睡不安席,食不甘味,经常挂在嘴上的话是:“哼,都说明官不好当,可没一个不想当官,小学生都想当班长;要么有钱,要么有权,两样都不沾,那日子难熬,难以抬起头啊。”她的占有欲、支配欲不断上升,追逐权力如患狂疾,她利用女性所有的优势,无孔不入,见风使舵,巧舌如簧,反客为主,于是从院长到局长,一步一步向上爬。作品写她“苦于自己不会长,脸黑身子白”,便去丰胸,做硅化胶乳房,诱发了乳腺恶疾,她不得不藏藏掖掖,疲于奔命,下场凄惨,有很深的警醒意味。这个设计好,不是人为的编造,有某种必然性。这个形象在当今无疑具有典型意义。

人是最有魅力、最有挖头的,只有抓住了人,人事、人心、人情,又有大量生

动细节保证,就能生出许多波澜和趣味。这部书的引人入胜,与它始终贴着主要人物的动机和手段向前推进有关;也与它写出了一定的人生韵味、感悟、甘苦、哲理有关。小说在臧否人物中,加入某种幽默和冷眼,不时点染,令人发笑。例如芮院长,为袒护马里红、助她升官挖空了心思,到头来却被马里红顶替掉了。他在提前退休前说:人的两鬓白发,一边是算计别人算计白了,另一边是被别人算计白了,都说我只有一边白,那是因为我芮某不会算计别人只会被别人算计。又说,上帝造人不合理,只在前面安了两只眼睛,人要自己给自己脑后安两只眼,云云。其牢骚和无奈可见。

中国的文学,向来有警世、喻世和醒世的传统,所谓“非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这被认为是载道,但这样的载道,若再伴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惩治系统,却是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李天岑的笔法,有劝谕讽喻意味,并杂以河南民间方言,有民间的道德批判精神和喜剧精神。这也许是他的作品受到民间喜欢的原因。

然而,细品全书,仍感缺乏一个宏阔的背景,大历史与小人物的关系,相互渗透,挖得不深。这倒不在于马里红多么小,而在于主要人物行动的动机应该来自历史深处的潮流,而不是琐碎的个人欲望。怎样把生活转化为艺术,不能满足于讲一个好玩的故事,要能够进入存在的深层。另一方面,臧否过于分明,善恶过于分明,脸谱过于分明,削弱了生活的复杂性。像马里红,恶到家了,有时贬斥到溢恶,她作为母亲、妻子,就没有过一丝善念和良知闪现?作品有点接近通俗小说的恶惩扬善的极致化写法了。



《人道》长达四十九万字,但是好看。一个极其平庸的马里红,竟然扶摇直上,几乎爬上高枝,好险啊!执政者当戒。

这得力于作者讲故事的本领。虽然《人道》不像作者的前部长篇《人精》取自真人真事,但都源于作者之亲眼。特定的氛围、官场的虚伪、人物的举止、语言的内麻,以至官场的一些潜规则,绝非亲历者外所能言者。作者会讲故事,光怪陆离,但是你信。

伏尔泰说:我读了四遍《一千零一夜》后,才算是尝到故事体文艺的滋味。司汤达说:上帝最好让我忘记《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情节,以便再读一遍,重新得到美妙的故事所给予的乐趣。没有故事便没有小说,没有电影,更没有电视剧。不会编故事,不会吊人胃口、吸人眼球、出奇制胜的作家,很难说是高明的作家,除非他的作品极力淡化作品的戏剧性而非拒绝背后的故事。

马里红向上爬的手段极其拙劣,无非是亲自到领导家里看病量血压,带上小姐按一按,同路专员的太太近乎送一套“必好适”,到宾馆给冉书记示范按摩颈椎,给龚专员送偏头痛的药,让丈夫游海经营“红樱桃”夜总会,说黄段子,陪酒、灌酒,夜总会成了色情服务场所和权力交易所,而且,疏通领导是“三番五次地跑”。拉拢了多少干部!给调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的路安韬赠送王维的画(部长开口了:虽说我不在樱山了,但说话还有人听)……一个个被她攻破放倒,好好好,研究研究!”“以后有什么要帮忙的你只管说!”

奇怪,如此拙劣露骨的表演,竟然明效大验,百试不爽。固然,现实中不乏其例,但是,纸上得来终觉浅,宦海浮沉,水深得得很!

马里红口出狂言,竟然说:“白求恩他本国人都不学,我们还把他捧为神?”但是作者并没有给予马里红一个好的命运。在宣布取消副局长试用期以后,马里红惶惶不可终日,向“一脸嘴”占卜问卦,每天口念“我是金刚,威猛无比,天下无敌,无所不能”。鄙部长患肺癌,她暗自窃喜:“下一步坐他的交椅。”路部长答应她“明天联系联系”,她正在做第三次化疗,同时做她的升官梦,最后,光着头,像男人一样瘫倒在地,吓了人一跳,彻底的丑态百出。

依马里红之心看来,“医院现在救死扶伤不再是人道主义,而是唯钱主义”,所以《人道》告诫人们:“官场上小人是大忌。小人最可恶,小人最可恨,小人最可怕,小人最难防……其实,对待小人淡而化之,漠然视之,小人便会自生自灭。”这也许就是作者取名“人道”以对抗“唯钱”的命意所在。然而,“淡而化之”,小人未必“自生自灭”。有史以来“小人”与“君子”是一对孪生子,有君子就有小人,讲小人自生自灭,无非是作者的希望。但是作者所写的小人手腕拙劣,塑造的谦谦君子杨晓静的形象也较为单薄,正面力量缺乏理性高度,不能构成策略和智力间的明争暗斗,影响作品向人性和精神的深度作进一步的挖掘。《沧浪之水》及其改编的电视剧《岁月》写的也是官场里不择手段的钻营,可是罗清水和梁致远的际遇激起观众强烈的共鸣。它揭秘出职场的潜规则,正像闻局长所传授梁致远的那样:你可能不喜欢吴过,但是小人对你很有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不时地寻找自己的影子,这样,作品就深刻了。

如何将鲁迅所命名的《官场现形记》式的“谴责小说”提升到像《儒林外史》那样深刻的“讽刺小说”,是目前官场文学一个较迫切的课题。生怕投鼠忌器,难免笔下留情。

我对作者李天岑结构故事的才能表示欣赏,很希望《人道》和《人精》一样,改编成电视剧,进一步解析“人”,进一步认清官场上形形色色的“人”,让“人”在人道精神的光线下自尊自重、自强不息。

# 谴责与讽刺之间

□ 阎纲

# 写出「边沿地带」的丰富性

□ 何西来

李天岑把自己的《人道》界定“官场边沿人物”。他说,官场的中心是简单的,而边沿,是官场和非官场的交接部,因而也复杂得多。《人道》的故事,正是在樱山的这个错综复杂的官与非官的边沿地带展开的。至于中心是否真的简单,姑且勿论,但边沿地带的复杂和丰富,确实被李天岑以现实主义的笔墨、生动传神的细节、跌宕起伏的情节,鲜活灵动的语言,特别是性格鲜明的人物,真切地展露给了读者。

从《人道》之创造的艺术长卷看,李天岑虽是业余作家,其对小说写法的操控却已经相当老到、相当熟稔了。

《人道》的主人公有两位,一位是非党的业务型女干部杨晓静,毕业于北京正规的医科大学,精通医术,淡泊名利,并不热衷于做官,更鄙夷于钻营,有责任感,有事业心,从科主任到副院长,到卫生局副局长,凭的是本事,走的是正道。作者是把这样一个人物作为医疗卫生战线的骨干和支柱来写的,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正面人物。在生活的层面,她是另一位女主人公马里红的非自觉的竞争者;在艺术层面,她又是与马里红对照着写的,是马里红负面人格和行为的参照物。在作品中,用于这个人物描写的笔墨并不算少,但与马里红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细节与对话,就嫌弱。

我同样认为,写出马里红这样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是李天岑《人道》的重要贡献。像杨晓静一样,马里红也是从非官走进官场边沿的人物。她本是只有中专水平的兽医,却热衷于做官,用她丈夫游海的话说,是一个“官迷”。她靠了钻营,从医院的医疗器械管理人员,钻到老干部病房去做主任。她相信“想要官运好,主动靠领导”的潜规则,悟出了“接近小人物头只能得到小利,接近大人物头就能办大事”的道理。老干部病房虽说主要是和那些老弱病号打交道,却也是地区领导看病的地方,是些能够给你戴上乌纱帽和摘掉你鸟纱帽的人物,在这一点上,马里红远比茫无所知的杨晓静敏锐得多,她正是通过这个途径攀附上副专员路安韬的。缠住了路专员,利用他的权力杠杆,她如愿爬上了副院长的位置。权力的杠杆是需要交换的,马里红用的是她作为女人的色相,为此专门去整容医院做了隆胸术;另外,就是贿赂,如送画等。

权力资源是马里红在官场钻营、贪婪地向上攀爬的支点,她以猫一样敏锐的鼻子,判断每一个她碰到的大小“官人”的价值,然后像毒蜘蛛一样,结成一个为她所用的权力关系的网络。比如,通过路专员搭上主管组织的冉登高的关系,用美丽的乔叶子作诱饵搭上统战部副部长秘书司马凯的关系,等等。这个关系网的建立和运作都是以权换权、权钱、权色的交易为动力、为特色、为润滑剂的。正是靠了在这个权力网上的运作,马里红才一步步得以从医疗器械科主任到老干部病房主任,到医院副院长,到市卫生局副局长,到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马里红这样的艺术形象,是以这样的现实人物的大量存在为前提的。这样的人物的存在,又是以官本位的积习和理念的长期影响分不开的。除了两位女主人公,作品还写了其他许多人物,如老院长芮雪青、卫生局局长都大康、游海的表弟富来等,虽也不无可观之处,但都个性特点不十分鲜明。难得的是,作家在文学语言的运用上,大量吸收生活中活的、有生命力的成分,如大量流传民间的新俗语的运用等,多有可圈可点之处。

如果说,作品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藏露关系还可以处理得更好些。笔无藏锋、一览无遗,向来是操觚者的大忌,所以刘勰有“言所不追,笔固知止”之议。如果向含蓄蕴藉的方向着力,作品的篇幅也会更紧凑些。

# 《人道》人物形象塑造小议

□何镇邦

长篇小说《人道》的作者和编者均把它定位为“官场边缘小说”,是有他们的用意的。众所周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官场小说成了文坛的热点。但我们在这些成为热点的官场小说中所看到的,大都是一些被作家极尽化的官场生活描写,或官员腐败,或官场勾心斗角、刀光剑影、一片漆黑。这种过于极尽化的负面生活的描写,反映了官场的某些现状,让作者和读者都得到宣泄的快感,可是真实感却大打折扣,且负面影响也是多多的。李天岑的这部《人道》,有别于当下一些“官场小说”,它写的一些处于官场边沿“不算官也算官”的人如何钻营官的故事。而处于官场中心的几位真正的官,却写得很有分寸感,写出了官场的真实,也对当时的官场百态与官场文化作了较深入的描写与开掘。因此,这部作品不仅具有对官场现实的认识作用与对官本位观念的批判作用,而且具有某些人生的启迪意义。

小说的故事编得曲折生动、引人入胜,小说中的几组人物形象也塑造得相当成功,小说的语言朴素生动,富于乡土气息。在这儿,我想着重谈谈小说中的几组人物形象的塑造。

马里红与杨晓静,这是作者在小说中着墨最多、精心塑造的两个处于官场边沿的女性的形象。她们一反一正、一动一静,一个是学过兽医借医疗单位作为升官

阶梯的“官迷”,一个是名牌医学院毕业、医术精良、医德高尚、无心做官的良医,她们后来一为樱山地区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一为樱山地区卫生局的副局长,同为副处级,可是她们的行为处处成鲜明对比,人品也大相径庭。从为人来看,人们当然喜欢杨晓静,唾弃马里红;可是作为一个作家笔下的艺术形象来看,马里红却比杨晓静显得更丰满更立体,也更成功。马里红出生于贫困的农村家庭,从小就立志要当官,懂得当官可以改变她的命运。于是十六岁初中毕业回农村当了人民公社一名社员时就利用心目中的“人物头”大队长三麻子调戏她的机会当上了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后来,她在学了两年兽医之后到了樱山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药械库管药械,她自认为这里“与外界基本没啥接触”,“是十八层人下的人”,于是,借医院成立高干病房的机会,使出浑身解数活动,先是当上了老干部病房副主任,再借这个“青云梯”大步钻营,步步高升,由医院副院长而至卫生局副局长;在被免职摔了一跤后,又设法当上了樱山地区第

一人民医院的院长,恢复副处级;最后想“活动”把医院升为正处级时发现由于当年隆胸植入硅胶而诱发乳腺癌,又舍命陪酒,落了个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可悲结局。马里红一无背景,二无能力,全靠一身钻营的本事,利用官场上一些关系步步高升,达到了升官的目的。当然,她也使过一些坏招,干过一些坏事,但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无赖无品的小人而已。小说中把她比成沾上衣服就摘不掉的“苍耳子”,其实也就是一块令人生厌的“橡皮糖”而已。马里红这个人物形象在当下官场还是有其典型意义的。作者刻画这个形象时,固然用了一些漫画的手法,对她也缺乏一种“悲悯”之情,但这个形象的真实与美学意义是不容怀疑的。

比起马里红来,杨晓静的形象是作者审美理想的化身,当然她也是为了反衬对比马里红而设置的一个人物形象。作者也在杨晓静这个形象的塑造上花费不少笔墨,把她“温润如玉”的性格从各方面凸显出来,运用了不少成功的细节描写,并把她放在相当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来展示,因此形象是鲜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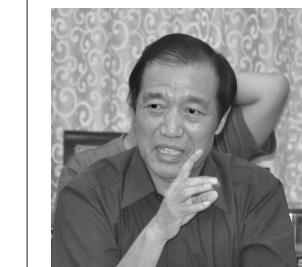
的,但总觉得不够丰满和立体。

小说中,几位处于官场核心地位的人物形象,诸如樱山地区第一人民医院院长芮雪青、地区卫生局局长都大康、副专员路安韬、地委副秘书长冉登高、专员龚以群,等等,着墨或多或少,都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他们或多或少被马里红所利用,或者说,怀着不同的心理在马里红的谋划道上帮了忙。比如说,路安韬就因为在高干病房认识了马里红,在南下考察路上有了那么一个不好启齿的夜晚,就被这块“橡皮糖”沾上了,成了马里红升官的一个重要筹码。老院长芮雪青是个很有性格的老干部,他是出于甩包袱的心理推马里红到地区卫生局当了副局长的;后来,又由于同情被免职的马里红,帮她活动,最后被马里红顶了位置,提前退休。冉登高之所以帮马里红说话,是因为在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身边当秘书的司马凯找了他,而他也需要司马凯为他在省里说话。这样写官场核心各位官员的举止言行,从不同角度来写他们为马里红所利用,就比较有分寸感,也比较真实可信。

李天岑被称为“文章太守”,在繁忙的政务岗位上多年来仍坚持业余创作,成绩斐然。当代文坛的繁荣,不仅要靠专业作家的创作,也要靠像李天岑这样的达到专业水平的业余作者支撑着。对于他们,我表示深深的敬意。

# 作家要有责任感

□李天岑



专家、评论家们对《人道》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令我受益匪浅。我当时在人物选择、人物把握和题材把握上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作家写作不仅是当作家,写小说也不仅是为了写小说。我记得有位评论家讲过,一个作品当读者看过以后,如果只是起到消遣作用或者是打发时间的作用,书本一放,该怎么做还怎么做,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对读者没一点启发和教育作用,这个作品应该是不成功的。所以说我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定位就定在要把对生活对人生的感受,通过对人物的塑造来传递给读者。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一个根本的目的,就想劝大家在做官的问题上不必苛求,要顺其自然,不必像马里红那样,为做官去付出沉痛的代价,这是我的出发点,也就是贺绍俊老师讲的“劝诫”。

究竟怎么来描写官场?我觉得一个作家要有责任感,要准确地把握官场,要让读者通过这部作品,真正了解官场并不像有的官场小说写得那么黑暗,也不是血淋淋的你争我夺、勾心斗角的残酷无情。官场里面光明面还是主要的,阴暗面还是次要的,官场有阴暗面也正像大树底下有阴影,是因为天上有太阳。我就想通过我的这部小说匡正一些官场小说走极端的偏向。